



令人笑场的“跪训” 谢佳 作



李升平

“不破不立”说来是个哲学命题,是有道理合理逻辑的。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也可说是为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发扬民族优良传统来做好“破”字文章。

## 也谈“最缺底线”

在近期市社科联开展的两年一届的评先中,我任会长的市杂文学会又被评为先进学会。这也可以认为是对我主办的会刊《杂文与生活》近年来针对一起反腐机关搞腐败保护主义案件实施舆论监督之举的道义上的支持,也是对我们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所作出的努力的鼓励。由此我感到,我这个“党风记者”在贯彻党的十八大“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英明决策方面理应继续有所作为。

去年底出版的 33 期《杂文与生活》发表了我一篇题为《“金盆洗手” 难矣哉!》的短文,文中谈到《南方周末》长文《为改革“站台”的老人们》介绍了一批很有名望的老专家学者“老而不休”的心态。我也有着同样的心态。著名老经济学家吴晗一段关于家国情怀的表述说得好:“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我已年过八旬,且喜头脑尚健,这种责任和担当意识也仍然难以淡化,仍然由自主一如既往地履行新闻舆论监督的神圣职责。

比如说,我作为“乡土杂文”的首创者和数十年写作实践者,手头这支颇具批判锋芒的“投枪”“匕首”般的笔杆子,还是不能“金盆洗手”束之高阁,对所见所闻还是常常感慨系之,不吐不快。不久前,我就“不吐不快”地愤笔写了篇时评杂文,题为《可怕的起码公德心的丧失》。《衡阳晚报》发表时取文中另一句话,把标题改为《文化塑城首在文化塑人》(《杂文报》等外报刊发表时仍用原题)。本文是就前些日子在“政协园”晨练时碰上的一个荒唐事发表感慨的。

那天,一妇女领着个黄澄澄的柚子,用长竹竿击打柚树上黄澄澄的柚子,我见了上前劝导制止,对方也许占错了便停下来拾起击落在地的柚子离去。那知旁边一位打扮时髦的中年妇女却冲着我說:“这是公家的,又不是你私人的,谁都可以摘打!”一再地反驳我,还指责我“管得宽”!你看,她不但帮我制止损坏公物、破坏绿化的行为,反而还“挺身而出”为之“打抱不平”,可见她的社会公德心已丧失到了何等地步!我写道:“可气又可悲的还有哩,这妇女如此一再无理顶撞我时,周围旁观者竟无一人出声为我帮腔!”

可悲啊!可怕啊!“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变成了“老鼠过街,人人装哑”了!

最近偶尔在一本刊物上读到著名人文学者易中天的一篇短文,题目是《中国最缺底线》。开篇写道:“你问当下中国缺什么,我看最缺底线,这很可怕。一个人没了底线,就

《同城微博》栏目, 登录新浪、腾讯微博, 搜索每周舆情关键词。读者可以与“衡阳日报湖湘周末评论版”腾讯、新浪微博互粉。

《一周评弹》栏目, 欢迎本报读者和特约评论作者纵论一周新闻事件。

《本土发言》栏目, 欢迎本报读者和特约评论作者就衡阳事发表看法。

《时事画赏》栏目, 主要刊登可供鉴赏的时事漫画。

《话不在多》栏目, 主要刊登一事一议的评论。

读者可投稿至邮箱 627131152@qq.com, 来稿请注明姓名或笔名、社会身份和联系方式。

特别鸣谢: 聿卫为此版提供人像漫画

### 同龙泣血

龙兮



今天我们谋求的政治改革, 不仅要立足于宪法去构建新型的社会政治制度, 而且要立足于道德和信念去造就我们这个时代能以天下为任的政治精英。那么, 首先要改革的是我们传统的政治哲学

## 内圣外王与外圣内王

内圣外王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一种最高道德和政治境界。所谓内圣就是通过道德修养的方式, 将个体内在的原始人性转化为一种完美的道德人格。所谓外王则是一种政治人格, 指在内在的道德人格的基础上, 把圣人的王道理想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体现出来, 实现治平天下的圣王理想。内圣外王实际上是指通过内心修养成为圣人, 再将其转化为兼济天下的政治。内圣和外王二者交互作用, 由内而外, 以外见内, 形成儒学内外兼修福慧双至的理想人格。

儒家无不讲道德, 也无不谈政治, 他们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 才会有正确的方向; 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 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 是霸道和暴政, 这样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 也是难以长久的。在内圣方面, 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 关键在于自己, 正所谓“我欲仁, 斯仁至矣”。在外王方面, 儒家以修己为起点, 以治人为终点。在儒家思想中, 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 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 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治人必先修己, 修己自然就能治人, 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 才能成为仁人和君子, 才能达到内圣。反过来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 才能够安邦治国, 达到外王的目的。

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 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他们要求政治家首先必须出自道德家, 而统治者只有先致力于圣人之道, 成为仁人, 才可能成为天下爱戴的政治家。

内圣外王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 其强调的是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的自身修行, 并不对外部社会制度有所诉求, 即要求完善自己的精神层次, 但不要求外部制度对个体的保障。与西方民主、宪政、自由主义制度相比, 内圣外王是通过内修的济世功用, 以实现个人理想和济世社会, 进而达到王道社会这一中国传统政治理想。

不过理想与现实总是对立的, 内圣外王之说, 也不能超越这样的宿命。在中国历史上合内圣与外王于一体的圣王从来没有出现过, 要么做内圣如孔子, 虽然修养极高, 却无从得势, 只能奔走各国, 惶惶如丧家之犬。要么外王如历朝君王, 权倾天下, 令行禁止, 却一个个视圣人必修之仁义道德如乌狗土龙。他们常常是内圣不外王, 外王不内圣。因此, 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真正能做到的, 仅是一门道德修养之学。因为道德和政治毕竟是有区别的, 道德上的圣人不一定就能成为政治上的王者。

其实, 道德是不能代替政治的, 马克思·韦伯在谈到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时说: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 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 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 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 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 可以是‘信念伦理’, 也可以是‘责任伦理’。这并不是说, 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 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责任的机会主义。当然, 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 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 即宗教意义上的

### 兩人杂谈

刘才文



“拿易经说事”系列说到第四回: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蛊”的解释是, “以毒药药人, 令人不自知者。”通过主流媒体看, 现今的贪官被“蛊”倒前, 也是晋老大的狗屎口气

## 人久宴溺而疾生之

去湘西的“凤凰古城”旅游, 其中的一个项目“套餐”是苗寨游。前往苗寨的途中, 意外领教了有幽灵恶鬼之称的“蛊”强加给游人的毛骨悚然。

去苗寨的“地陪”是当地的一个小后生, 二十出头, 瘦干矮小, 一言一行都张扬着生怕游人不抬举他聪明的那种。他海阔天空, 自称是苗裔, 反复强调自己是被传授过放蛊和捉蛊秘诀的人。但以我的生活阅历考量, 横看竖看都无法从他那狡黠的表情里, 触摸到苗岭敦厚的质感。其表演很显得笨拙, 其言谈更俗不可耐。

在车的颠簸中, “地陪”便处心积虑地显摆他的自作聪明, 活灵活现地说苗家的大人孩子极少有不懂得放“蛊”的。被放了“蛊”的人如果不及及时由苗人救治, 必死无疑。前不久有几个外地游客被放了“蛊”, 就很快惨痛的死了。

“地陪”不时用恐惧的眼神扫视着表情紧张的女性游客说, 被“蛊”了的人也可以不死, 只须花钱请苗人把蛊捉出来就可活着回家。但被捉到的蛊只能放养到捉蛊人自己的身体里, 不然会满天的飞, 所以捉蛊人每时每刻都得忍受着被蛊煎熬的痛苦, 比死还难受, 所以捉蛊是要收辛苦钱的。假如你不肯给钱, 他会再把蛊放回到你的身上, 方式极为简单, 放蛊的人只须喊你一声, 你一回应, 蛊就进入了你的身体。他特意举荐说, 自己是根正的苗裔, 经常为被“蛊”的游人捉蛊。

绕着弯子说了是一大遭, “地陪”是在猎取出钱的猎物。若按“地陪”所说, 车上众多的人都应该被放了蛊, 因为刚上车时, “地陪”曾尖着嗓子问过众人, 你们是衡阳来的吗? 不少人随意应声“是”。可见, “蛊”是防不胜防的。

期间“地陪”接了一个电话, 回话声近乎嘶声力竭, 受话者似乎不是对方, 而是车上的游人。“地陪”说, 先将被“蛊”了的游客安顿好, 等把衡阳的团带到目的地后, 立马赶过去捉蛊。挂断后“地陪”很神秘地说, 被“蛊”人的痛苦是一阵子, 要么很惨的死了, 要么被苗人救了, 但捉“蛊”的人得痛苦一辈子, 没有真传连一天都不能活。

我对这个透顶聪明的“地陪”开玩笑说, 既然苗人个个都是放“蛊”的高手, 在清朝清军追杀苗人时, 苗人就用不着逃进这穷乡僻壤的深山, 悠哉在凤凰城, 把清军都给“蛊”了, 岂不快活?“地陪”无语。进入苗寨, 我等在怪石突兀的村寨走了一遭, 接触了摆摊的老人和东跑西窜的孩子, 幸运的是未曾碰见放“蛊”者和被“蛊”的游人。

“蛊”有幽灵之恶, 究竟是何物? 翻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虫部四》, 可看到这位明代医药学家引自他人之说的文字, “取百虫入瓮中, 经年开之, 必有一虫尽食诸虫, 即此名为蛊。”那只食尽诸虫而不断的剧毒之虫就是“蛊”。在中医学术上, “蛊”即指诸种虫蛇的毒气。凡中毒者, 心腹刺痛, 胸膈支满, 吐血下血, 寒热闷乱, 呈面色青黄或枯黑等危象。综上所述, “蛊”是因虫毒而引起的一种并不常见的病。说到“放蛊”, 应是流传于少数民族中的一种传说, 如同“赶尸”的传说, 人人都说有, 但又都难以说清白。传说的翅膀有着超常的穿透力, 它的威力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

《左传》是春秋末期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昭公元年》所载的史实成就了一个“蛊”为何物的挺有趣的故事。说是晋国的老大晋平公

得了一种重病, 令本国的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 无奈之下向国外求援。泰国的老大秦景公派了医和这位大名鼎鼎的医家增援。名医的最大特点是绝不忽悠病人, 诊脉后医和直截了当地对晋老大说, “您这病没治了!” 不过“您患的不是什么正经毛病, 是纵欲过度落下的。这种病就像蛊进入身体一样。”晋国的权臣赵孟适问“蛊”是何物。医和说, “过度沉溺于某种事物达到病态的程度就是蛊。”医和解释说, “蛊”字上边是个“虫”字, 下边是“皿”字, 器皿里的虫子就是蛊。比如粮食在储藏时生出的虫子, 开始是蠕虫, 不久即变成飞蛾, 那也是蛊。还有一种蛊, 就是《易经》里的蛊卦, 意思是女人迷惑男人, 大风吹落山木。这三类事物都是蛊。赵孟适体投地的说, 医和“良医也”, “厚其礼归之”。

这则史实很是精彩。令人思索的有如下几点: 其一, 晋老大原本没病, 却症状很重; 其二, 本国的任何一个医生都治不了; 其三, 国外的医生说晋老大身体里生了绝命的“蛊”病; 其四, 《易经》的蛊卦卦象是大风吹落山木。结论是, 蛊不除, 晋老大只有翘辫子的份。治疗晋老大的重病, 千言万语只须一句话: 老大也, 少“写”些课外作业吧! 就这么轻巧。

晋国那么多的医家高手难道不懂这点医理? 当然都懂, 但都不吱声的装傻, 因为晋老大沉溺于一把手擅权的享受, 感觉良好的不知有死, 老子天下第一, 好的就是这一口, 谁胆敢说透了, 老大白眼一翻说, 靠! 我一把手团弄几个小妮子咋的啦? 靠! 庸医, 拉出去砍!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蛊”的解释是, “以毒药药人, 令人不自知者。”通过主流媒体看, 现今的贪官被“蛊”倒前, 也是晋老大的狗屎口气, 靠, 我堂堂一把手理应公车私有, 公款私用, 咋的啦? 这就是最典型的“蛊”病的证候。

假若晋老大砍了医和的脑壳, 秦老大会说, 靠, 砍我的人, 打你娘卖拐, 这就砍出国际争端。所以国际性确保了医和不但有资格说真话, 而且分析病因那才叫绝: 天有六种气象, 阴、阳、风、雨、晦、明。淫过了头了就会产生六疾, 阴过生寒, 阳过生热, 风过手脚生病, 雨过生腹疾, 晦过迷糊, 明过生病。亲近女色属阳, 得热病必然。所以亲近得有节制, 否则死翘翘。他还要说贪财如命将……。中医学上有种说法, “医”“易”同理。医和一分钱的面子不留的给晋老大了堂社会哲学和“易理”课。

“蛊”卦是《易经》中的第十八卦, 《象传》对此卦的释义是, “山下有风, 蛊。君子以振民育德。”其卦象是上卦是山, 下卦是风。山下有风, 受阻而不能行时, 湿气闷热, 则产生“蛊”。在久闭生蛊的时代, 君子应该以此卦象为启示, 积极振救民风, 养育自身的道德情操, 抵制乱人心智的蛊惑。“蛊惑”是使人迷惑的意思, “蛊惑人心”的成语即源于《易经》的蛊卦。关于蛊卦的爻辞也很精彩, 因篇幅所限, 暂且忽略。

行文至此, 还得提及那个“地陪”, 他使出浑身招数的表演, 是不折不扣形象的“蛊惑”过程, 不应者很难被放蛊的。蛊是客观存在的, 应与不应是主观性的, 晋老大式的角儿们主观上沉溺, 不被蛊易理则不存。沉溺是一种病入膏肓的固执错误的绝症, 正如苏轼讲解蛊卦时说过的, “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谓之蛊……蛊之灾非一日之故也”。